

确立“十四年抗战”的重大意义

□ 张从田



不是“事变”是战争

□ 刘庆怀

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用“事变”来指称一系列战争行为，其用意是掩盖侵略事实、逃避侵略战争的罪责，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近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修订大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将8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这一决定，对尊重历史事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振兴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对“九一八”究竟是一场事变还是一场战争，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首先，“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是有法律和文献依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我们认定对华战争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战争。”19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怀着妄图灭亡中国继而称霸亚洲，变中国和亚洲各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野心，入侵别国领土，把大炮和刺刀强加在别国人民的头上，实施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行为。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回避和不承认“九一八战争”，坚称这一事件为“事变”。不仅如此，继九一八战争之后，日本每侵占一地，统统叫做“事变”，诸如“上海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上海事变”等，甚至把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都叫作“支那事变”。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战犯，在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仍然谎称“日本历代内阁都不承认在中国的敌对行为是战争”，“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存在着战争的状态；纷争只是‘事变’，所以不能适用战争法规”。不难看出，日本当局之所以叫做“事变”而不是“战争”，其用心是要再掩耳盗铃的政治流氓手段，借以掩盖侵略事实，逃避侵略战争的罪责罢了。1948年10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历史审判时指出：“我们认定对华战争自1931年以后是侵略战争”。显然，用“事变”这个模糊的概念，不能正确表达在中国人民的大地上中日两国军队交火的血腥事实，更不能正确表达日本军队从预谋、计划、准备并实施大规模进攻中国的战争罪恶事实。因此，必须遵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法律定义，把这一事件叫做“九一八战争”，而不是“九一八事变”。

其次，“九一八”是“战争”不是“事变”，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何为事变？《辞海》中云，事变即突然发生的非常事件，或非常变异的事。其要点是“突然”、“非常”、“变异”，并未表明其性质，是个中性词。何为战争？《辞海》中云，战争即为了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进行的武装斗争。或解释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或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最高形式。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军队编造“柳条湖附近铁路被炸毁”的谎言，在中国腹地乘中国军队之不备，突然无端地向中国军队开炮，是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满地地道的侵略行为。据中日两国历史文献记载，当时中国方面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伤亡25人。日本军队一夜之间，即19日凌晨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紧接着于1931年12月22日，日本又以“讨伐辽西土匪”为名，发动了辽西战役，1932年1月3日占领中国锦州，仅用4个月零18天于1932年2月5日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整个东三省。另外，1932年1月28日，日本以“伤害日本侨民”为借口，发动了“一·二八上海战争”；1932年7月18日，日本侵犯热河省；同年12月8日，日本侵占了中国山海关；1933年3月10日，日本向中国的长城展开总攻击；1935年10月日本指使汉奸暴动，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发动冀东战争；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展开大规模进攻，并以中国为战争基地，向东亚各国进军……由此可见，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日本军队侵犯中国的罪恶行为紧锣密鼓，一天也没有停止，全中华民族的抗日烈火，一天也没有停熄。只是日本侵华战争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比一次疯狂，一次比一次残酷，战火连绵不断，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终战”，战争一直延续了14年。近几年，众多国内外史学专家、学者公认，正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突袭中国军队的事件，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同时也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总之，大量充分且无可争辩的事实，从战争的预谋、计划和准备，战争的目标、战争的延续、战争的规模、战争的结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等方面，都充分表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无端袭击中国军队的事件，是地地道道的战争行为，绝非用“事变”这一中性词语能准确表达清楚的。因此应该叫做“九一八战争”而不是“九一八事变”。

历史的观念是完整的，是不容模糊的，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准确无误。笔者认为，14年抗战的整体概念应当主要包括：中国人民14年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所有参与抗战不惜流血牺牲的人们，不分党派都是民族英雄；中国14年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发点，中国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部战场；日本军国主义打响了第一枪，挑起战争，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中国14年战争的始作俑者；中国14年抗战，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成功和胜利；中国14年抗战，这一历史阶段的起始与终止，应该是以1931年9月18日夜，以王铁汉为首的中国人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终战”结束。对这一重大历史阶段概念的表述，用“事变”这个中性词语显然不适用，是中国14年抗战这一完整概念的缺失，更重要的是模糊了战争正义与罪恶的本质区别，掩盖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所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了逃避战争罪责的追诉坚持辩称：日本和中国之间没有存在着战争的状态，纷争只是“事变”，不适用战争法规。历史是面镜子，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和义务把这面镜子擦亮，准确无误地把这面历史明镜传递下去，还原历史真相。我们必须清清楚楚，明确无误地告诉下一代，“九一八”就是战争，而不是事变。

(作者系山东省审计厅退休干部)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 檬

定了6年局部抗战的历史地位，完整还原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真正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二是有利于客观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一是民族解放战争，二是人民战争。前者要求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者要求充分地动员和组织民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斗争。这既是处于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免遭厄运的客观要求，也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选择。掌握国家政权的国民党集团，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方针，推行对内武力“剿共”、对外妥协甚至“不抵抗”的错误政策，既削弱了抗日力量，也给了日本侵略中国以可乘之机。

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首先高举武装抗日的大旗，肩负起民族解放先锋的历史重任。中共中央自“九一八”事变后即通电全国，号召广大民众迅速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建立反日武装，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并于1932年4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正式对日宣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下，东北地区的爱国军民冲破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一度形成抗日斗争的高潮。义勇军斗争受挫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至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共组建11个军，3万余人，活动范围遍及南满、东满、吉东、北满70余县的广大地区。东北抗日联军和此前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扰乱了日军进攻中国关内的计划。继东北爱国军民开始抗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屡掀高潮，上海军民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一线和察哈尔、绥远等地的爱国军民相继展开了英勇抗战，从而使局部抗战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

为了汇聚尽可能多的力量以抗日御侮，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积极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在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即发表了愿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对日作战。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此后，为促进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合作抗日，中共中央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特别是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合作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准备了全民族抗战

的前提条件。中国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评价说：“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

如果说抗日战争的历史是靠全民族的力量写就的，是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写就的，那么在局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的力量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无疑是不可磨灭的。如果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前6年局部抗战中没有起主导作用甚至还在一个时期内阻挠抗战，就否定这6年抗战的存在，那也是不符合抗日战争实际的。所以，以“十四年抗战”来叙述抗日战争的历史，不仅能够涵盖卢沟桥事变之前爱国军民所进行的抗争，比如东北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以及“一·二九”运动等重要内容，而且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率先号召并领导广大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凸显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是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法西斯先后粉墨登场，将这些国家推上法西斯侵略扩张的轨道，威胁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正义。日本率先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也是法西斯在全球侵略扩张行动的第一个节点。从那时起，日本法西斯既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也是世界人民的凶恶敌人。

然而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仅在国内受到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的束缚，而且还曾在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当时，英、法、美等为了各自利益都极力避免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对其侵略行径采取了“中立”“不干涉”的绥靖政策。苏联虽在道义上同情中国，谴责日本的侵略，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各大大国对日本侵略中国行径的放任和纵容，客观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致使日本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也不断加强欧洲和亚洲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战略配合，加快相互勾结，称霸世界的步伐。法西斯国家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

历史把中华民族推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中国人民不但肩负起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而且承担了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责任。“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猖狂进攻，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

模反法西斯战场，并逐渐发展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至1939年9月战争在欧洲爆发时，中国已独立进行了8年的抗战；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独立抗战则已持续了10年之久。在漫长而艰难的抗战岁月里，中国不仅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战，同时也在为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而战。历史表明，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确立“十四年抗战”，更能完整地审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密切关联，更能完整地体现中国人民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正义与进步事业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更能完整地讲好“中国抗战故事”。

四是有利于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伟大的抗日战争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将抗战精神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这是中华儿女在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形成的深沉社会心理和基本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支撑。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大多数中国人只有血缘亲缘认同和乡土认同，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对国家的责任、现代国家意识淡薄。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犹如沉重一击，此后中国各族各界民众迅速地觉醒起来，展现出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主义意识，逐渐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热潮，用血肉筑成了一座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正如外国人评价的：这是东方睡狮的觉醒。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并延续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伟大的时代传承光荣的历史，呼唤伟大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上。面对一系列重大挑战，我们需要深入发掘抗日战争留下的宝贵战略遗产和历久弥新的历史启迪，尤其需要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获取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坚定“四个自信”，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从历史使命和时代方位来看，确立“十四年抗战”恰逢其时。

(本文转自2017年2月6日人民日报，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为什么是“十四年抗战”

□ 于兴卫



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是中国抗战重要组成部分。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的第一天起，东北军民就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抵抗。由东北军爱国官兵、工人、农民、学生、爱国知识分子甚至部分爱国绿林英雄组成的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纷纷拿起武器抵抗日本的侵略。仅半年时间，东三省抗日义勇军总数就发展到30多万人。在东北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据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抗日义勇军就袭击辽、吉两省重要城镇30次，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城市，控制了安东(今丹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长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配合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开展。在东北军和义勇军相继失败后，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因此，九一八事变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日本侵占东北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中国军民的局部抗战也没有局限在东北。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侵略，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蒋光鼐、蔡廷锴率第19路军，奋起抵抗，迫使日军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使其受到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在占领东北后，日本还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及关内地区。从1933年起，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先后侵占热河和长城及其以南地区，以至于“华北之大，已安放下不了一张平静的书桌”。驻守长城防线、察绥地区的国民党军以及长城内外的义勇军，激于民族义愤，先后进行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及绥远抗战等。华北危急，北平青年学生开启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掀起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诞生在这一时期。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也是为歌颂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大刀队”而作。

因此，“十四年抗战”不是否定“八年抗战”，而是对前六年局部抗战的肯定，是对前六年局部抗战中中国军民出生入死、不畏强

敌、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肯定，更是对牺牲在战场上的抗日英烈的应有尊重。再次，“十四年抗战”概念是对抗日战争人民性的充分肯定。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政府宣战作为敌我双方交战的开始，并以此作为“八年抗战”的依据，但这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当时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的时间不是在七七事变后，而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1941年12月。作为一场反侵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与两国两军间的普通战争有很大不同，这是一场弱国反抗强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抗日战争不是一场简单的政府和军队之间对决的战争，而是一场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并发挥了巨大力量的人民战争，是一场促进民族觉醒民族团结的战争。人民群众由战争的旁观者跃身于重要的参与者，人民性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独特特性。这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不是由军队的一两个大的作战行动所决定，而是由人民群众的动员和参与程度来决定的。因此，在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就不宜单纯以政府是否宣战作为“标准”。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局部抗战的六年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极力压制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甚至调集十几万大军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进行围剿破坏民众抗战，还捏造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领导人，造成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并不能阻止广大爱国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意愿，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分别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对日战争宣言》等十份文件，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号召收复失地，抗日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城乡蓬勃兴起。九一八事变后，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下转18版)

近日，有关部门提出要在教材中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曾经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了“八年抗战”，但随着抗战研究的深入，“十四年抗战”的概念逐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的大会讲话中，都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把十四年的抗战作为一个整体。国内较早的有代表的抗战史著作，如军事科学院编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国防大学何理教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央党史研究室王秀鑫和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等，都是以十四年抗战作为研究框架。

“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它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全面和科学地认识中国的抗日战争。

首先，“十四年抗战”概念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以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原理。而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折点。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入侵中国，独占中国东北并逐步向山海关内进逼，企图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从而加深了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日本和中国的矛盾在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中突出出来，中日矛盾迅速成为中国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九一八事变后，不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